

儿童视角与代际共鸣

——东黎《房上有只猫》的文本张力

崔昕平

东黎老师与儿童文学的“缘分”说来话长。上世纪80年代,东黎即有儿童文学作品发表。30余年间,东黎也并未与儿童文学绝缘,或长或短,时有作品发表。《鸡的故事》《黑白照片》还都曾获得过“赵树理文学奖·儿童文学奖”。东黎的童年书写,有着鲜明的、独属于她那一代人的童年记忆与时代印记,《房上有只猫》(希望出版社)仍然是这样的一部散文化儿童小说集。其书写形式常常表现为一种追随意识流动的回忆捕捉。真切的情感体验在童真视角和与同构的节制书写中形成了文本特有的张力。

检验一部作品是否有真正的儿童文学品质,首先大约就是一种回到童年的叙事视角了。东黎的作品,有着较为精准的儿童视角。作家的心理,这些富有时代感的童年记忆影像仿佛仍如昨日。儿童视角的与众不同之处,首先便是对外在世界无差别、无等级的“关注”。这一点,是与成人世界形成鲜明对照的。诸如成人世界的一些带有功利性的价值评判,在儿童这里是不存在的。比如对于动物。儿童往往对动物世界体现出较之于成人更多的关注。这源自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动物与人一样,是无差别的。《房上有只猫》中,有一段“我”对农村短暂生活期间养的那头小猪的细致描述,且对小猪迎接泔水的场景没有丝毫的“嫌弃”,孩子真诚地感受着它的快乐。那是一种平等心态下的、长久的关注。于是有了这样的妙笔:“我有时端着碗,蹲在猪圈的矮墙上,看它吃饭,自己也吃饭,不自觉地能多吃一些饭。”也因为这份对万事万物无功利的关注,孩子眼中,往往有许多成人忽略的“景致”。比如孩子所关注到的墙头草间“一条细绳似的小道”,那是小猫咪咪的小肉垫踩出来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儿童视角,自然,纯粹。

儿童视角的另一个特点,对成人世界打量中的懵懵懂懂。作品中有个小插曲,叫“女人的想法真是奇怪”。这是父亲的话,缘起于母亲向往南方,要求买一张南方的竹椅,理由是至少靠竹椅感受一下南方的气息。而事实上,竹椅买回来,倒成了父亲的专用。这个生活中不起眼的小情节,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有着真实的情感温度。而且,这种懵懵懂懂也没有停留在原始状态,它借助一句话,更深层地“走进”了孩子满是问号的小脑瓜,“父亲坐在竹椅上抽烟,打盹。眯着眼时,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像母亲那样向往着南方。”这很考验作家的视角掌控,是纯正的儿童滋味。

作家东黎的创作是随性的,也是从心而不吐不快时才会见诸笔端的。许多作品有着鲜明的自我印记,也呈现着鲜明的时代印记。那些难忘的童年记忆,化作景观、滋味、画面等丰富的感知记忆,在作品中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童年味蕾记忆。作品中讲到北方的冻梨吃法如同游戏,是可以取了柄吸着吃的;讲第一次吃南方的橘子,是令她吃惊的“清冽酸甜”的滋味;尤其是描绘富有地方特色小零食酸枣面,无论是令人迷惑的形色,还是入口的滋味,都写得极为传神。作品中还有着密集的细节,《如影随形》中描绘小姑娘追着迎风而飞的书页,“它好像



《房上有只猫》封面图

有灵魂,在逗我,忽高忽低”“后来,也许是那张纸飞累了,它突然像折了翼的鸟,翻飞着慢慢飘落下来”,描绘小姑娘读这页纸,“读着读着,我有了关于森林、河流、房屋、道路的情境想象,很美好。但这美好,随着最后的半句话戛然而止”。透过这些篇章,一个孩子的想象便栩栩如生了,是那样一个女孩子,纯真,率性,敏感,好学,精力充沛,有丰富的爱心与好奇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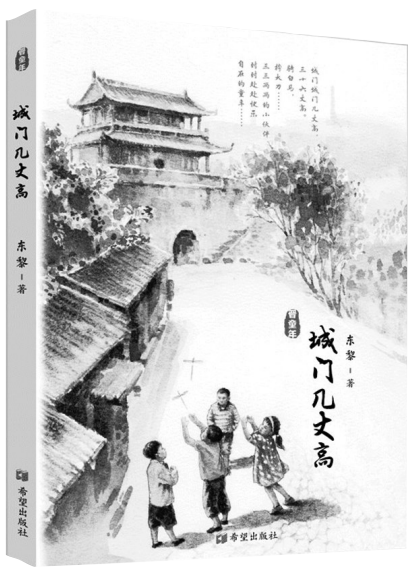
正因为作家的创作是从心而出的,因而,从另一个层面讲,东黎老师的《房上有只猫》也不仅仅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或者说,作家并没有将自己的创作局限在儿童读者,而是首先从真切的情感与思想表达出发,同时也是写给自己,写成成年读者的。这也是我们常常引用的那句话,好的儿童文学必然是适合老少共读的。如果作品仅仅迎合了儿童读者的阅读与理解能力,那这样的儿童文学是刻意“蹲”下来的儿童文学。优秀的儿童文学内里,应该站着一个洞察童年与人生的作家,将人间美好的情感、人生的所获,以儿童适读的形式传达出来。也因此,儿童读者从阅读中收获他们这个年龄可以读懂的东西,同时在他们由儿童到少年、成年的人生旅途中,回忆起这些作品时,仍能不断获得些什么。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品,也就真正留在了儿童的心灵建构与文学素养建构之中。

当然,这样一种尺度的把握,是非常考验作家功力的。《房上有只猫》中,有的篇章与当代儿童的共鸣度比较有限,但有的篇章则具有能够同时打动成人读者与儿童读者的穿透性。让他们反观成人世界的理性(或者叫做冷酷),看到孩子身上对待生灵、无差别的悲悯心。同样是因为儿童对万事万物无功利的关注,儿童文学作品中往往传达出一种具有人类反思价值的“童心”力量。

风雨沧桑 童心依旧

——东黎《城门几丈高》的语言魅力

刘媛媛



《城门几丈高》

“假如10岁那年东黎去了文工团,她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呢?”夏末的雨天里,我手里拿着《城门几丈高》(希望出版社)陷入遐想。

回忆童年生活,大概是每一位作家的必由之路,也是读者乐于阅读的题材之一,这种文字至少会吸引两类读者,一类是作家的同龄人,借由作家的回忆重温童年时代,在文字里寻找属于一代人的共同气息;另一类是其他年龄层的,他们从中看见不一样的童年,或惊讶或陌生,领略到生在不同时代命运的大相径庭。

这就涉及到作者的写作视角和读者定位。

《城门几丈高》写的是作者儿时的生活经历、上世纪60年代的生活。历经半个多世纪回望曾经的过往,每个人恐怕都会有很多感慨,有的人不愿回顾,是因为装载了太多的苦痛;有的人津津乐道,是因为充满甜蜜幸福;当然更多的人是有乐交织,从回望中重新思考发现,对时代和个体命运有新的认识。东黎这本书就是通过儿童视角,重现了那个特定年代普通人的生活,他们在时代的波浪里起伏颠簸,身不由己。这本书的上篇是写“我”和我们一家在小城的生活,以及和北京阿姨们生活的交错,通过一个孩子的观察,从细节处生动再现时代大风暴来临前的种种“端倪”,下篇写我们全家来到了一个叫“莫村”的小村庄,在这里的生活和看到的生活。

我曾经用“风烟俱净”形容东黎的文字,意思是东黎的文字简洁干净,枝蔓少,没有矫情的抒情议论,以叙述描写为主,情感节制。单从这一点,初中的学生读这本书会有很大的收益。文无定法,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表达主题和表达风格,但无论怎样的内容怎样的技巧,都需要由语言来呈现,对语言文字的驾驭或者说一个写作

这些年养成一个阅读习惯,拿到新书时随便翻开一页,看是否能有一句话让我对整本书产生阅读兴趣。这句话,往往能体现作者的表达风格和精神气质,而我正是想通过这句话来寻找与作者在表达风格和精神气质上的契合点。

拿到赵树义的《折叠的时空》(山西教育出版社)时,我期待的在第10页第二段出现了:“……望见沁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的刹那,空间陡然开阔起来,眼前出现一大片滩涂。我让宋勇去停车场等候,自己独往源头。宋勇知道我这个习惯,笑一笑,说声小心。”

“独往源头”告诉我,这不是成群结队、热热闹闹的产物。那作者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走进沁源他乡写成这本书的?带着这个疑惑和如何“独往源头”的猜想,我开始从头读起这本书。

赵树义每写一本书,要么创作一个独特的文本,要么完成人生的一个重大梦想,总之,每一次写作都是要开一条新路,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那么,作者究竟想通过《折叠的时空》,完成什么样的人生梦想呢?这些,作者在第一章就交代了:

十多年前,我萌生了一个想法:走遍上党所有的古村落,写一部关于上党风土人情的书。……不是累,而是沁源的山水草木像一块磁铁,不但吸附住我的双脚,还勾走我的魂魄。想起多年未了的愿望,突然意识到,沁源不仅有我向往的古村落,还有我想走的河流。仿佛一团火熊熊燃烧起来,当即决定休假,在沁源住下来。

沁源是赵树义实现多年梦想的一个理想地,这里有古村落,有山川河流,有赵树义钟情的各种树(或者说绿)和鸟儿,还有那些相识多年的熟人朋友。在一个村庄完整度过一天,推门进去,与村庄里的某一位村民无忌讳地聊会儿;夜幕降临后去村里转悠转悠,天蒙蒙亮起来在河边走走,顺便在河里洗把脸。可以说,在沁源,而不是老家长子(与沁源同属上党),赵树义的乡愁在离开家乡近40年后第一次得到了满满的释放。

在“独往源头”的路上,作者看到了沁源独特的自然山水之美,这些美通过作者的妙笔,不时会在书中出现,让你跟随他一起畅游沁源。同时,赵树义也擅长观察人事,是讲故事的高手。他在处理人与我的关系上,有其让人特别感到“舒服”的地方,那就是让每一位与他同行的人,都自然地出现在他的笔下,并且是作为主人公,而不仅仅是陪伴人员。

作为主人公,这些沁源人在书中,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作者在第四章中提到了庞汉杰这位带领右玉人大战黄沙洼、绿化右玉的沁源人,就是一个典型中的典型。相对于书中其他沁源人,这位沁源人是在沁源之外把他身上的那股沁源脾性发挥到了极致,从而也创造了奇迹。正如作者所说:

而庞汉杰大战黄沙洼的树种,便是从沁源带去的。如今,说到“右玉精神”不得不提庞汉杰,说到庞汉杰不得不提沁源,说到沁源不得不提积善庄,庞汉杰不仅把沁源的树种带到右玉,把沁源的绿搬到右玉,还把沁源人的善良、朴实、吃苦耐劳和坚忍不拔也传到右玉。

我对沁源人的印象,通过作者对庞汉杰的转述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而不是推翻。如果说庞汉杰这样的大人物身上的沁源脾性有一种文化自觉,那么《折叠的时空》也注意到并记录了那些小人物身上的沁源脾性。在第九章,通过郑曙林的讲述,卖凉粉的女子——王秀池进入了作者的视线,这位沁源女子与摊位附近一窝福马鸡相处的平凡故事,再一次让外人见识了沁源脾性:

一个农村妇女竟与一窝福马鸡相安无事多年,我们沁源人爱鸟已不单是一种习惯,那是爱到骨子里了。讲完王秀池的故事,郑曙林如是总结。

根据沁源文化专家郑曙林的总结,我终于可以给沁源脾性一个相对准确的描述了,那就是“爱到骨子里”。在《折叠的时空》里,赵树义笔下出现的沁源人,无论是爱绿,爱鸟,还是爱沁源,都给人一种“爱到骨子里”的感觉。老郑、郑曙林、宋勇,都是这样,也正是因为他们对沁源的热爱到了“爱到骨子里”的分上,赵树义的“独往源头”,才收获满满。

我是一个对什么事和物都达不到“爱到骨子里”的人,《折叠的时空》里出现的每一个人,都触到了我的痛点,这就够了。

在童书创作中拾遗补缺

梁晓声

●我之所以写童书,有如下原因:一是我的成长史中没有童书阅读经历,是成为作家后读了一些童书,包括很多以儿童视角切入的温暖的、带有童话色彩的成人作品,对我影响特别大。我想我是作家,应该写这样的作品;二是我在儿童电视剧厂十多年,那时关注儿童文学多;三是我在决定写儿童文学之前,扫描了中国的童书出版。

●有一个时期我有意识地考察电影市场的情况,发现国外的动画电影中动物和生活联系在一起,比如《帕丁顿熊》,熊和形形色色的大人的成长连在一起。国内的儿童文学不是这样。父母带孩子进电影院,什么最逗乐看什么,因此我们看贺岁片,有一个共性就是“乐”字。我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让母亲和孩子一个乐子,接一个乐子,但我不能写,不能读着想要什么写什么,我只写我希望你们读的东西。

●我就是作家,就要拾遗补缺。童书在很大程度上有两点是我要补充的。一是励志。很多童书主题跟《狮子王》差不多:“我行,我一定行!”像安徒生的《丑小鸭》,它是天鹅种,如果它是野鸭种呢?所有孩子不能都是“狮子王”,不可能都是海瑞乔纳森。理发师、面点师……平凡的人就不能出色吗?我要用《白鹤阿甲》传达“平凡也能出色”的观念。二是爱心。现实生活中缺失爱心的例子不少,比如动物的被虐待。我觉得爱心要从娃娃抓起。

●知识性不是主要的,是否经得起知识检验也不是主要的。《小王子》一开始说,大人看就是一顶帽子,小孩子才能看出是一条正在消化大象的巨蟒,这不符合生活,违反知识性,但它能打动孩子的情感。

●视角非常重要。大家都认为大学应该讲成人文学,大学课堂一定是通过文学作品分析人物所面临的困惑——为什么不能读安徒生?我认为《丑小鸭》并不是安徒生最好的作品,过于流露出了出身决定论的思想。丑小鸭长大后成了天鹅,飞起来了,但是我们设想,更多的现象是,如果就是一只麻雀呢?它有了天鹅梦,怎么办?再梦也不能成为天鹅,但可以变成连天鹅都尊重的麻雀。

●我不太知道是不是所有家长都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了能赢,要么自己言传身教,要么借助读物来给自己的儿女找到一种力量,好像恨不得尽早让孩子明白,这是一个竞争的世界。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这样的话,家长和拳击教练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想我们有可能善而强?

●首先你要有感觉,别人对你的友善,你没有感觉的话几乎等于不存在。一个人抱怨生活不如内省自己。如果抱怨别人冷,是否别人给你温暖而你却没有反应。我提醒读者感激友谊,哪怕是微小的帮助。

●我有一篇散文叫《赶集》,这篇散文应该写在二十五六年前,那时我50岁左右。其中有3名同学,在《我那些成长的烦恼》中都提到过,这本文字里的名字大抵都是真名,我哥哥的老师的名字,老师的老伴的名字……都是真名。我认为生活中应该感谢的人——最大的感激应该写进书里,成为永远的纪念。因为是真的,而且心里经常想着,不会忘记,不需要进行虚构。

●我不希望我的书里有搏击打斗,不希望向儿童传达为了竞争“上位”什么都可以做,我不希望推动这些。我这样写,家长们如饥似渴地用这样的读物为孩子狮子——我不希望加入这个行列,我也不认为这是好的现象。

●我确实感觉到,现实生活中有些孩子被疫情深度影响了。为什么作家不记录在案?《可可木木和老八》写疫情期间的成长,父母是医务工作者,这两部作品被《小说月报》头条转载,编年度合订本时收入了,所以说这样的书是“桥梁书”,一方面是给孩子看的,但首先它是文学作品。

●全世界、全人类千百年来都重视对儿童的教化这件事情。“教化”二字一定是庄重的,如果是反义的,那不是教化本身的问题。只不过看教化什么,教化爱永远都不过分。

●写作的过程也是和自己对话的过程。但不影响读者也教化自己,写作是自我教育的过程。我写作的过程也会像沐浴了一样。我相信,这样才能写得自然而不矫情。如果矫情,真诚度是打折的。好多写作者忽略了这个问题,要是把这些搞清楚,写作的技巧性都在第二位。

●在我的成长史中很少遇到坏人。所有故事中的情节都是有温度的,可能跟我看问题的角度有关,也可能是基因的影响。我的母亲没有和邻居们红过脸。再就是读书,我年轻的时候读了很多俄罗斯文学作品,那些文学作品中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宽容悲悯的情怀对我影响很大。我下乡之前经历“文革”,经历了6年的知青生活,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生活中也经历过很多不愉快。但是我觉得这些恰恰可以在生活中忽略不计。谁也没有理由活得那么超脱。比较之后就会觉得,你没有记住的必要。所以在写作中我是选择性的记忆,有意识地体现温暖。那些不友好的表现,都会变成人生在世一些微不足道的浮云。

(据《中华读书报》记者访谈整理)

独往源头 触碰沁源

赵树义《折叠的时空》独特之处

解建军



罗企航(辽宁传媒学院书法学院大四学生)

本版面向读者征集“双塔”刊头作品以来,陆续收到一批书法与美术设计作品,并择其适用者刊载。

欢迎广大读者继续参与刊头征集活动,作品原稿请挂号寄至:太原市新建路78号新闻大厦太原日报专刊采编中心 杨斌收;邮政编码:030002。或可直接投稿(新闻大厦18层,联系电话:8222115;邮箱:tyrbyb@163.com)。并请附作者地址、邮编、电话、职业身份介绍。